

财税政策何以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刘明慧 李 秋

(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116025)

内容摘要：财税政策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表现为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核心在于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体现为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等。财税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体现为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调节新质生产力的产出分配效应，助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激励技术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策源，强化创新场景赋能打造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集群融合发展和构建最优产业生态打造新质生产力聚集源。在政策工具上，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的有力工具，可以有效优化资本的吸引和配置，通过人才流动、知识转移和风险缓解，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涌现。而补贴政策则通过直接资金支持、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来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成长。因此，未来财税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推动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发展，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促进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四化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

关键词：财税政策；新质生产力；四链融合；四新；四化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4)03-031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4.03.004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在当前全球经济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新质生产力包括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高端制造等一系列领域，其共同特点是代表了最前沿的技术进步，且与传统产业模式根本不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应用，更新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活动模式。同时，绿色能源的发展更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绿色能源技术，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正逐渐取代传统化石燃料，成为新能源发展的方向。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有深远的影响。它们不仅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的模式，还推进了全球经济

收稿日期：2024-2-12

*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生态创新的财税政策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ZDA076）子课题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刘明慧（1963—），女，辽宁庄河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人才，研究方向：事财税理论与管理等问题研究；李秋（1989—），女，辽宁大连人，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政税务等问题研究。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结构的重组。培育和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成长,需要国家在科技、教育、财政和政策等多个方面进行。但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包括技术更新速度快、市场需求变化大、技术普及难和应用不平衡等问题。这些挑战需要通过合理的政策引导支持,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财税政策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在激励和引导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税收减免等,财税政策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研发和投资决策,进而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虽然财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被广泛讨论,但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仍需深入探究。如何有效利用财税政策来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涌现,不仅是经济政策制定的关键问题,也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途径,能助力产业发展、平衡区域经济、加强环境保护、推动国际合作。在产业经济学领域,财税政策对特定产业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政策工具如税收优惠、补贴等能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胡晓辉,2021;P Duvendack et al.,2022)。在医药制造业,财税政策通过提供研发补贴和税收减免,刺激了新药的研发和市场推广(陶春海,2022)。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财税政策通过提升资源配置和增加研发投入,加速产业的成长和成熟(胡慧芳,2022;Mamatzakis E,2023)。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和面板数据分析等定量分析法,研究者发现财税政策能够有效调动产业内部资源,促进产业向更高附加值方向发展(甘行琼、雷正,2022;岳喜优,2023)。

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财税政策对不同地区和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通过对城乡地区的不同税收政策,平衡地区间的资源分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王莹,2021)。通过案例研究和政策分析,揭示了财税政策在调节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在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平衡方面的贡献(杨复卫、张新民,2017)。此外,对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研究表明,财税政策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和推动区域合作,加强了区域内部的经济联系,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胡绪华,2017)。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的文献强调了财税政策在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作用,环保税和绿色信贷等政策工具不仅支持了绿色低碳产业的成长,还促进了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研究表明,这些政策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带动了新的经济增长点(Jamelia Harris,2023)。在研究方法上,模型构建和政策评估被用来分析财税政策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等方面的有效性。在国际经济学领域,财税政策的国际视角同样受到关注。跨国财税政策的研究涉及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如东盟)的合作。比较研究和国际案例分析揭示了不同国家在财税政策方面的异同,以及政策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唐红祥、许露元,2023)。财税政策在促进国际合作、平衡贸易关系、增强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财税政策的国际协调变得日益重要。

本研究旨在解答以下关键问题:财税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是什么?不同类型的财税政策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上存在何种区别?如何设计和实施更有效的财税政策,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通过深入探讨财税政策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丰富和发展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与此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将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建议,设计和实施更有效的财税政策,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涌现和发展。

二、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和特征

新质生产力代表当代先进生产力的新阶段,其产生背景和核心特征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技术进步上,更体

现在生产要素组合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上(中央财办,2023)^①。

(一)新质生产力体现为生产力系统性新质化

从经济学和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生产力的新质化不仅是技术和产业进步的体现,也是社会发展动力的源泉。生产力新质化包括一般性新质化和系统性新质化。一般性新质化通过不断的技术迭代和创新,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提供丰富的资源,促进生活质量的提升和社会文化的繁荣。这种质变虽然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但其影响相对有限,往往局限于特定领域或行业。相比之下,系统性新质化作为生产力发展的高级阶段,通过整合各类生产要素和创新成果,形成更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影响。不仅会改变生产方式,重塑产业结构,还会促进新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形成,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得益于质变的深度和广度,使系统性新质化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养和资本流动等都扮演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共同构成了推动生产力新质化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动力系统。

(二)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技术革命性的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体现在其科技创新驱动、融合性和可持续性上。作为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核心,科技创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也推动了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的革新。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新材料等领域,颠覆性技术的涌现,改变产品生产方式和服务方式,优化生产力和效率,推动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的出现。有部分研究阐释了颠覆性创新如何通过创造新产品,最终导致现有产品的消亡,从而影响总体生产力。Bell & Gluesing (2020)研究了汽车行业颠覆性技术的发展现状和社会影响。Ayentimi T. & Burgess J. (2019)的研究强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和颠覆性技术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展示了高度技术化机器取代人工劳动的负面冲击,指出未来对工业 4.0 技能的专业人士需求巨大。颠覆性技术改变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方式,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结构,颠覆性技术的涌现还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进步,重塑社会和经济环境。

与此同时,新质生产力展现出显著的融合性,特别是科技与经济、不同产业间的深度融合,跨界合作和资源共享极大地提升了整个经济体的适应性和竞争力。此外,新质生产力注重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的和谐共生,体现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深远考量。在时代特征方面,新质生产力紧密贴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数字化特征明显,利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推动生产活动的创新和效率提升。同时,新质生产力强调高质量发展,通过创新驱动和结构优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此外,新质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创新性可持续发展,通过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变革,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全球经济合作和发展贡献了力量,体现了新时代全球创新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三)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对劳动力、资本、知识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和优化组合,强调了知识与信息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人工智能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改变劳动力的角色和生产过程。在此模式下,劳动力不仅是体力劳动的提供者,更是知识和创新能力的载体。劳动者的角色从传统的简单劳动力提供者转变为创新和智能化工作的执行者。与此同时,劳动资料的范畴也得到了拓展。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机械工具,还包含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工具和系统以及高效的信息技术平台。劳动资料的升级提高了整体产业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先进的劳动资料增强了产品的创新性和市场适应性。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生产的对象也越来越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物理产品,还有日益增长的知识型产品和服务。多样化的生产对象转变,对劳动力市场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具有创新思维、技术能力和跨领域知识的人才需求量在大幅增

^① 人民网.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 中央财办最新解读[EB/O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3/1218/c1004-40141533.html>, 2023-12-18.

加,这促使教育体系进行改革,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培养更多具备未来技能的劳动者。

同时,资本更注重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会倾向投资能带来长期增长的技术领域。此外,数据也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资源。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数据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企业通过分析和应用大量数据,精准预测市场趋势、优化产品设计、提高生产效率。数据的应用还助力于成本控制和风险管理,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随着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的潜力被进一步挖掘,已成为驱动企业和整个社会前进的关键动力。如何高效管理和利用数据,是现代企业的战略重点之一,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起到了核心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当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促进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使其质变,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经济向更高效、可持续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三、财税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逻辑

(一) 财税政策推动塑造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生产力即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能力,包括人的劳动能力、生产工具(技术、设备)和劳动对象(自然资源)。生产关系则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包括所有制形式、劳动组织方式、产品分配和交换方式。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而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决定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超出了旧生产关系的承载范围时,必须对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革,以形成与新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生产关系。落后的生产关系体现为:所有制形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组织方式和劳动方式滞后,以及分配方式和交换方式不能有效促进生产力的提升。这些落后的生产关系不仅阻碍了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也抑制了社会总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科技进步和创新活动不断深入的结果,不仅包括新的生产技术、生产方法,还涉及新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技能。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现有的生产关系提出了挑战和改革要求。财税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它通过调整税收和政府支出,对经济活动进行影响和引导。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财税政策能够起到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促进所有制多元化和激发市场活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化,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在所有制形式中,除了传统的国有、集体、私营所有制之外,混合所有制、合伙人所有制等新型所有制形式也在逐渐增加。财税政策通过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提供平等的税收待遇,鼓励私营、外资及合资企业的发展,促进所有制多元化;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实施税收减免政策,降低创业门槛,鼓励创业创新。通过优化税收结构,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充分竞争。第二,鼓励灵活就业和劳动关系改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也带来了更加灵活多样的劳动形式,如远程劳动、弹性工作、项目制工作等。这就要求劳动关系调整,以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和劳动者需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自由职业者和远程工作者,如减免个体工商户税、简化税务流程,促进灵活就业。

(二) 财税政策调节新质生产力的产出分配效应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等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对经济产出的分配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技术进步导致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引起技能溢价的显著提升。其次,新技术的应用提高了资本的效率和收益率,使得资本收入相对于劳动收入的比重有所增加,改变了劳资收入的比例分配。再次,新

质生产力的发展还导致了就业结构的根本变动,一些行业和职位可能会消失,而新兴产业的崛起则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机会。最后,技术创新和新产业的发展往往集中于特定区域,这可能会加剧不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这些变化共同塑造了新质生产力对产出分配效应的多维影响,不仅改变了劳动市场的结构,也重新定义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格局。

在宏观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内,财税政策通过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促进、收入分配的调节、研发和创新的激励、资本配置的优化,以及支持就业和地区平衡发展的策略,实现对新质生产力的产出分配效应的调节,从而起到长期可持续的推动作用。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指出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财税政策通过教育和培训补贴促进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力技能,进而推动经济向包容性增长转型。其次,依据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经济学理论,政府可以利用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减少不平等,增强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从而支撑长期稳定增长。此外,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长期增长的关键,财税政策通过研发税收优惠等措施激励技术创新,保证经济增长动力。同时,资本积累理论指出,有效的资本配置对增长至关重要,财税政策通过税收优惠引导资本向高效领域流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最后,空间经济学和区域发展理论强调地区发展平衡的必要性,财税政策通过支持欠发达地区减少地区间经济差异,促进全国范围的均衡发展。

(三)财税政策激励技术创新,打造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策源

科技创新已被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塑造现代商业生态的关键因素。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特别是能够引发“创造性破坏”的革命性创新。在此过程中,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出现为新兴企业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使其成为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首先,科技创新改变了传统的生产要素配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转型等技术创新为企业提供了新的运营和管理工具,改善生产效率,使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个性化。例如,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高效处理巨量数据,为决策提供支持,同时促进了新的商业模式如数据驱动的营销和客户服务出现。其次,新兴企业通过采用创新技术,展示出显著成长性和价值创新能力。这些企业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或服务,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例如,许多初创企业在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领域通过创新解决方案,迅速发展成为行业的领军者和独角兽。科技创新在微观层面上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塑造现代商业生态的核心。新兴企业利用创新,表现出强大的成长性和价值创新能力,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和社会文化的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经济学理论中,政府通过财税政策介入市场以激励创新的做法,主要基于市场失灵的理论。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某些条件下不能有效地分配资源,特别是在创新活动方面。在自由市场体系中,由于创新活动具有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研发成果的非排他性和公共品属性,私人部门在研发投入上普遍存在欠缺。因此,政府的干预,特别是通过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手段,被视为纠正市场失灵、提高整体社会创新水平的有效方法。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而成功的必然性并不可测。此外,创新活动的结果往往具有非排他性,一项创新成果可能被多个实体无成本共享,这导致了潜在的“搭便车”行为,即一些企业可能选择不投资于研发,而是等待他人的创新成果出现后再加以利用。创新存在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自由市场中,私人企业通常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去做决策。当创新投资的风险和成本高于预期回报时,企业可能会减少或不愿意投资于研发活动,导致市场在创新资源分配上失灵。而且许多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的特性,可以被多方共享。这种特性使私人企业很难从投资创新中获得足够的回报,降低了其研发的动力。基于此,政府通过财税政策干预市场,补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不足,特别是在研发领域,旨在提高社会总体的创新水平。通过税收优惠和补贴,政府降低了私人企业在创新活动上的成本和风险,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另外,政府的干预还包括促进知识共享和技术转移,能加速创新的普及和应用,提高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

(四) 财税政策强化创新场景赋能, 打造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 集聚式涌现的新技术对于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集聚效应促进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创新力、成长力和市场竞争力。正如 Michael Porter 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强调的, 技术创新和产业集群是推动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Porter, 1990)。集聚式涌现的新技术, 通过整合资源, 促进信息交流, 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首先, 新技术的集聚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在此过程, 技术创新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推动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信息技术领域, 云计算和大数据发展不仅带动了 IT 行业的变革, 也为传统行业如制造业、金融业等提供了新机遇。新技术的应用让这些行业更高效地处理信息, 优化运营流程, 提高整体竞争力。其次, 新技术的集聚加速了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涌现。在这些新业态中, 企业可以通过技术创新, 找到市场的新需求点和增长点。例如, 共享经济的兴起就是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满足了消费者对于灵活、便捷服务的需求。基于技术的新业态在改变了传统商业模式的同时,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另外, 新技术的集聚还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在技术集聚的环境中, 企业更容易获取最新的科技信息、招募到优秀的人才, 并与其他企业、研究机构进行合作交流。以上因素共同促进了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加快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出。此外, 企业在技术集聚的环境中更易获得投资与政策支持, 有利其长期发展和市场扩张。最后, 新技术的集聚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汇集到某一区域, 形成产业集群, 推动区域经济的整体成长。产业集群中的企业可以相互学习、合作和竞争, 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其在强化创新场景赋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财税政策不仅可以激发企业和个人的创新活力, 还能促使集聚式创新的出现, 促进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首先, 财税政策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或提供资金支持来刺激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例如, 政府设立专项基金, 支持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平台的建设及创新型企业的孵化。这些资助可以帮助企业减轻研发初期的资金压力, 还能引导私人资本投入到高风险但有高成长潜力的领域。其次, 税收优惠是激励企业创新的另一重要手段。政府通过减免研发相关的税费, 鼓励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提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等政策, 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提高研发投入的回报率, 从而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此外, 财税政策还可以通过优化资源配置, 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例如, 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支持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或通过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业态的兴起。诸多帮扶政策不仅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还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财税政策在推动新模式的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 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 支持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在传统行业中的应用, 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新模式的发展能够提升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 财税政策推动集群融合发展和构建最优产业生态, 打造新质生产力聚集源

财税政策在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融合发展的机理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产业链整合的协同效应和生态系统优化等方面。

产业链整合在财税政策的框架下发挥积极作用。财税政策通过激励和指导, 有效促进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在税收优惠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 通过财税政策的激励机制, 促进企业在供应链管理、生产流程、销售和分销等方面形成有效的协作, 增强产业链各环节的内部效率, 提升了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 产业链整合的实现涉及多个层面。首先, 财税政策通过提供研发税收减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 鼓励企业增加技术研发投入,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紧密合作。例如, 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制造商可以共同研发新材料、新工艺, 多环节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其次, 财税政策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 帮助中小企业融入产

业链,促进产业链的多元化健康发展。如政府可以提供特定行业的税收优惠,鼓励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形成更为完善和协调的产业链结构。此外,财税政策在促进跨行业合作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通过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可以促使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共同的平台上协作,实现技术共享、资源共享。跨行业的合作不仅有助于开拓新市场,也促进了新技术和新业态的产生,为产业链整合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最后,财税政策通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加强不同地区产业链的互联互通,形成更广泛的产业网络。有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因此,财税政策在产业链整合中提供的政策帮扶,不仅可以推动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发展,还能促进跨行业、跨区域合作,加强产业链的综合竞争力。

财税政策对构建新质生产力产业的生态系统也非常重要。通过实施精准高效的财税措施,如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府为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在内的综合支持体系,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产业生态系统的全面发展。综合系统性支持对于加快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率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税收优惠政策。对研发活动的税收减免,能直接降低企业创新的成本,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为产业生态系统内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动力。对创新型企业和高技术产业给予的税收优惠,可以吸引更多资本和人才投入到这些领域,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第二,财政补贴政策。对关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为企业提供必要的物理基础和技术平台,包括提升研发实验室的设备水平、建立数据中心、优化交通和物流网络等,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基础设施的完善,能直接服务于产业发展,有助于提升社会的科技水平 and 生活质量。同时,财税政策通过吸引企业聚集,形成产业集群,促进产业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技术协同。产业集群内的企业能够共享研发资源、市场信息和人才池,实现协同效应,加速创新的步伐。协同不仅限于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也包括不同产业间的合作,如传统制造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第三,财税政策通过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和其他合作模式,鼓励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的协作。这种合作模式能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和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共同解决复杂的技术挑战,如环境保护、能源效率提升和智慧城市建设等。政府还可以提供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到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服务项目中,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

四、财税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工具

财政税收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税率调整、补贴政策、政府采购投资、转移支付和预算政策,其中税收调整、补贴等是最常见的政策工具。

(一) 税收优惠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

首先,税收优惠政策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投资的有效工具。通过提供研发支出的税收抵扣和减免,可以显著降低研发成本,增强企业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研发的积极性。OECD 的研究表明,税收优惠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的研发强度,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适当设计的税收激励措施能刺激企业的创新活动,提高整体经济的创新能力。

其次,税收优惠政策的效果不仅体现在直接减少研发成本上,还包括吸引更多私人投资流向创新领域,优化资源配置,来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有效优化资本的吸引及配置,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对投资于新兴产业和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本提供税收激励,政府能够吸引更多私人投资流向这些领域。此激励机制促进了资本向高增长潜力领域的流动,帮助了这些行业克服启动及扩张阶段的资金短缺问题。同时,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助于实现更为高效的资源配置。通过为关键产业和新兴产业提供税收减免,政府能够引导资本向这些产业流动,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税收优惠政策

还可以促进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有助于形成更加开放和互联的全球创新网络。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能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战略性的投资决策,鼓励企业更倾向于投资可能带来长期收益但短期内风险较高的项目,从而推动整个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再次,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风险缓解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创新活动通常伴随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初创企业和小微企业,创新风险可能成为其发展的重大障碍。税收优惠政策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有效的风险缓解机制,减轻企业在研发和创新过程中的财务负担,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创新项目中。尤其是在初创阶段,企业资金紧张,税收优惠成为支撑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最后,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促进人才流动和知识转移,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为科研人员和高技术人才提供税收减免,有助于吸引关键人才并留住他们,人才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Barroso R., 2022)。税收优惠政策还鼓励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加速技术的转移和应用,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政府通过提供研发税收优惠,激励企业加强与研究机构、高校的合作,促进学术成果的工业化转化。此外,税收优惠政策还可以促进跨国人才和知识的流动,加强国际合作和全球创新网络的构建。通过这些方式,税收优惠不仅在国内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技术的传播与创新。

(二) 补贴政策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机理

补贴政策通过直接资金支持、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1. 直接资金支持

与税收政策的间接财政激励不同,补贴政策属于直接资金支持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政府的创新补贴不仅补充了企业的资金,降低研发风险,还直接分配了社会资源给企业,鼓励社会资源参与创新活动。补贴可以减轻企业自身为创新活动所必需的内源性财务负担,减少研发和创新的成本,让企业有更多的资本用于研发创新。政府创新补贴也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质量,共享企业承担的研发和创新活动风险。补贴还帮助企业在政策层面上定义创新的方向,促进企业与政府、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补贴政策旨在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的常见做法(Bozdoganoglu B., 2022)。然而,补贴的目标策略应该是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政府补贴填补了由于创新风险和信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败的缺口。从中国发展的实践来看,随着廉价劳动力优势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创新的重要性变得更加迫切,支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对于中国迈向制造强国尤为重要。

2. 特定产业支持

补贴政策通过促进特定领域的发展显著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这些补贴通常针对特定技术或行业,能够有效地推动这些领域的研发和商业化进程。与直接资金支持不同,专注于特定领域的补贴政策对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独特的机理。

首先,专门针对某些关键技术或行业的补贴能够加速这些领域内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政府选择对可再生能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领域给予特别的支持,不仅直接增加了这些领域的研发资金,也提高了这些领域的吸引力,吸纳更多的科研人员和企业投入。其次,针对特定领域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形成产业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传播。当政府选择支持某一特定行业或技术时,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形成所谓的“创新热点”。这样的集聚效应有利于知识的交流和技术的共享,进而加速了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再者,特定领域的补贴政策也能够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日益增加。政府对特定领域的支持可能会吸引国际投资,促进跨国公司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从而加速技术创新和全球知识共享。最后,专注于特定领域的补贴政策有助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对环境友好型技术和绿色能源项目给予特别支持,政府不仅能促进

这些领域的技术创新,还能引导社会和经济朝着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因此,补贴政策通过专门支持特定技术和行业,增强了这些领域的研发能力和商业化进程,加速行业内的知识交流和技术共享,促进国际合作与竞争,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推进国内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提高其全球市场的参与度和竞争性。补贴政策在提升新质生产力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方面,尤其是在高科技及新兴产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不仅增强了国内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而且直接支持了企业的创新活动。这些补贴通过增强企业市场地位,提升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如中国对新能源产业的补贴,显著提升了其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3 年我国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 1.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29.9%,而我国出口同比增长仅仅只有 0.6%。

五、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一)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

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财税政策可以通过提供税收激励、财政补贴、投融资支持以及人才优惠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些政策机制主要作用在于降低企业的研发创新成本,鼓励技术研发应用,如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通过风险投资税收优惠和小微企业税负减轻政策改善企业融资条件,促进资金链的有效流通;通过人才引进税收减免和提供人才公寓等政策吸引和稳定关键人才,加强人才链的建设。此外,政府通过实施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重大创新项目和跨界融合项目,降低企业转型升级的风险。这一系列财税政策的实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优质高端的要素条件,强化新质生产力发展动力。

(二)推动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发展,激发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

通过深化和扩展财税政策,政府不仅针对新产业、新形态、新业态、新模式等“四新”领域提供直接的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从而降低创新创业的门槛和成本,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和投资热情,同时也通过构建更加公平和高效的市场环境,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财税政策通过鼓励跨行业合作、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优化资本市场功能、增强人才激励机制等多维度手段,有效地促进“四新”领域的融合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快速成长提供坚实基础。税收优惠和财政支持还需要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强支持,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向更加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向发展。

(三)促进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四化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

通过设计一整套财政税收政策,积极推动产业高端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等“四化”战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障。财政税收政策不仅重点关注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还需要在关键技术和新兴领域的研发投入提供资金和税收支持,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升级,而且通过优化税收结构和调整财政支出优先级,激发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特别是在数实融合方面,政府可以采取一系列财税政策措施,包括提供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税收优惠,如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和数字化改造的税收减免,以鼓励企业增加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施针对数字技术应用的财政补贴政策,支持跨界融合项目和数字服务业的发展,如智能制造和智慧农业项目的专项资金支持,以及对提供数字化服务企业的税收减免;推出支持数字创新与创业的税收激励措施,减轻创新创业企业的初期运营财政压力,并通过个人所得税优惠吸引和留住关键数字技术人才。智能化升级方面,政策可以采用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实现生产流程和服务流程的智能优化。在绿色转型方面,通过对环保项目和清洁能源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促进绿色低

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引导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升级。□

参考文献:

1. 甘行琼,雷正.我国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有效性研究[J].税务研究,2022(07):142—145.
2. 胡慧芳,欧忠辉,唐彤彤.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实效——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经验证据[J].东南学术,2022(05):141—152.
3. 胡晓辉.财税政策产业激励效应的异质性分析——以中国医药制造业为例[J].浙江学刊,2021(02):120—129.
4. 胡绪华,徐骏杰,马诗萌.财税政策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空间结构优化效应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23):40—46.
5. 唐红祥,许露元.推动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合作的财税政策研究[J].税务研究,2023(06):118—123.
6. 陶春海,焦荣荣,罗鉴,王玉晓.财税政策对医药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22,41(05):899—915.
7. 王莹.“十四五”时期四川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财税政策探讨[J].财政科学,2021(04):145—151+160.
8. 杨复卫,张新民.支持养老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工具选择与应用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3(06):49—59+193—194.
9. 岳喜优.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的财税政策探讨[J].学术交流,2023(06):134—145.
10. Ayentimi, T., Burgess, J. I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Relevant to Sub-Saharan Africa?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 2019,31(6): 641—652.
11. Barroso, R., N’Gatta, D., Ormazabal, G. Individual Wealth Taxes and Corporate Payou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22,98 (5): 31—60.
12. Bozdoganoglu, B., Gerçek, A. Current Issu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in Public[M]. FinanceBerlin, Bern, Bruxelles, New York, Oxford, Warszawa, Wien, 2022.
13. Donna L. Bell, Julia Gluesing. The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Mobil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Anthropology, 2020(9):225—250.
14. Jamelia Harris, A. Lawson. Mainstreaming Sustainability in Public Finances: Where PFM Meets Landscape Approaches[J]. Policy Design and Practice, 2023,6(3): 313—327.
15. Mamatzakakis, E., Pegkas, P., Staikouras, C. The Impact of Debt, Tax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on Earnings Management: The Case of Greece[J]. Managerial Finance, 2023,49 (1):110—134.
16. 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0, 37 (3): 507—510.
17. P., Duvendack, M., Macdonald, K. Fintech and Tax in Sub-Saharan Africa: Taxation Versus Financial Inclusion[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2022,15(3):79—112.

How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ity

LIU Ming-hui LI Qiu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 Tax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116025)

Abstract: How do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drive the emergenc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he connotation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manifested in the systemic new-quality of the productivity system, with the core being the r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 in technology, reflected in the innovative configur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the deep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among others.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fiscal and tax policies driving the emergence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is embodied in shaping the production relations that adapt to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regulating the output distribution effec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ity to promote long-term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reate a

(上接第 13 页)

DENG Jin-qian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Xi Jinping has deeply grasped the objective law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ounded a series of key issue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ideas and measure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generative logic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summarizes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this important exposition as the "seven view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 the fundamental task view of guiding modernization, the 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 position view, the coordinated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strategy view,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view of reform and innovation,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ckground view,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view of all-round ope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guarantee view of the party leading the economy. Therefore,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national and world conditions, but also is 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is a theoretical system formed in practice and continuously enriched in new practice.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 41 —